



打开“短经典”这扇窗

□唐 山

从 2011年4月至今,“短经典”系列(上海九久读书人策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已出版27种。这是一套以介绍当代世界精品短篇小说为己任的丛书,对于真正热爱小说的读者来说,其中的每本都是精品。

粗略地看,过去百年中国曾有两次大规模引入外国小说的高潮,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积极成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读者对小说的认识,使之从闲书、“海淫海盗”变成了“人生导师”、“精神营养品”;而消极成果是过于匆忙与功利,于是,小说“严肃”且“崇高”了起来,可我们究竟写出了多少“高层次”的东西呢?

我们总想把人家的好东西嫁接过来,却走进了“严复悖论”中:任何文明成果一旦从其体系中剥离出来,都将失去活力,而将整个体系照搬过来,又不大可能。

欲突破这个困境,就要从基础做起,就要对不同文化有更全面、更扎实、更深入的了解。事实上,西方小说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作家

说,人的存在建构在时间基础之上,一旦脱离了血缘、宗族、集体记忆、习俗等,其自我就会被取消,这就在叙事中形成了对清晰的时间脉络、历史感的高度依赖。

相比之下,城市生活是高度开放的,每个人必须接受碎片化生存模式,父母、亲族成了陌生人,再没有什么理由能完全解释如此纷繁的偶然性。城市人在回溯自己的经历时,时间脉络总是凌乱而模糊的,在叙事中采取跳跃、含混、错接等策略,符合现代人的感受。明白了这层因素,再回头看某些曾经的创作,常常是为形式而形式,甚至将现代技巧理解成是新的抒情路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太喜欢引入“经典之作”,然而,它们在经过时间考验之后,其情绪、技术、思考等无一不老。以这样的文本为师,导致我们的作家特别喜欢追求所谓的“永恒的小说”,这说明,我们对当下小说高度无知,想追也不知道该怎么追,小说与实际生活失去了真实的联系,找不到根基和营养。

更真实地描写它,对作家构成全新的挑战。

第四,更强的隐喻性,甚至可以说,现代小说越来越像复杂的寓言。一方面,现代人的迷茫源于概括的失败,由于世界不再清晰,我们只能从比喻中挖取智慧,以建立共同的感受。另一方面,现代教育与千篇一律的城市生活已将现代人完全格式化,写出彼此的不同已经没有意义,决定你我的不再是性格或者思考,而是遭遇。

总之,像老一代作家那样,编一个完整的故事,传达一点点粗浅的感受,这种慢速、封闭、教条、简单的写作方法已经过时,无法打动今天的读者。

展现人性的更多可能

与“短经典”的作品相比,我们的小说常常是单调的,因为写不好边缘人,我们的小说表达的多是一种向往、怀念与致敬,是“高贵的东西”,而不是探索,不是反抗的工具,没有边缘就没有改变,就不可能产生颠覆性的认识乃至革命性的创新。在这一点上,“短经典”提供了很好的样板。

以丹尼斯·约翰逊的《耶稣之子》为例,每篇小说都是从吸毒者、罪犯的视角来看世界,他们像普通人一样,也在努力地与生活维持着相安无事的关系。他们不是更低层次的人,内心中并没有对“正常”的向往,犯罪只是一种行为方式,由于不断重复,所以变得疲惫。自由的边缘是不断受刺激后的麻木,没有对个体自由的充分体验,写不出这种临界感。

再比如迪伦马特的《抛锚》,几个退休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用模拟审判来取乐,他们成功地“证明”一名无辜的陌生人犯了滔天大罪,并最终将他处死。这种对人类理性的批判在卡夫卡、加缪笔下有充分的展现,这个传统之所以能延续下来,因为小说保持了其独立性,不同于生活,才能批判生活。如果将小说看成是审美,是世界的一个装饰,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至于科伦·麦凯恩,他的情绪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展现了城市化对人类心灵的伤害;我们失去了与大地之间的联系,丧失了确定感和方向感。然而,他的表现方式却迥然不同,比如《姐妹》,带有浓浓的象征意味,作品通过一个人的内心挣扎,隐喻一个时代的挣扎。而《黑河钓事》更绝妙,写了一个来自日本的异乡人在小村中的孤独生活,他像谜一样存在和死去,只留下贴了一层又一层墙纸的蜗居。

我们某些作家太关注一个人、一个故事的完美,喜欢以小见大,而不太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悲剧性,不能以大见小。因为从环境上看,我们普遍缺乏公共生活,往往用个体原则替代公义;从传统上看,我们缺乏相关思想资源与文化的积淀;从经验上看,我们正沉浸在城市飞速发展的眩晕感中,只能幼稚地选择沉醉或反感,而非被迫接受后的屈辱、无奈与恐惧。

“民族特色”正在消失

在以往的视野中,印度、摩洛哥、津巴布韦等属于文学的“小国”,然而,从收入“短经典”的几个集子来看,他们的成就实在有些让人震惊。

以印度的阿拉文德·阿迪加的《两次暗杀之间》为例,以再老实不过的写实主义写出了

真实而厚重的世界。书中有几个故事略显俗套,但作家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位置,他始终和被侮辱、被伤害的人们站在一起。同为发展中国家,书中的内容在中国也存在,可我们有多少作家会站到卖油炸臭豆腐的、开“摩的”的拉黑活的、贴小广告的以及制服与身材不匹配的小保安们中间呢?我们真的了解他们的梦想与苦难吗?如果没有这种真诚,又有什么理由自称写实主义呢?

再比如摩洛哥的塔哈尔·本·杰伦的《初恋是决恋》,将阿拉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极富睿智与启迪的文本,相比之下,我们当下的小说写作与传统则基本是割裂的。

鲁迅先生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全球化时代,这句话是否依然有效,要打上一个问号。

毕竟我们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中: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获得的资讯量相差无几。在一个没有文学传统的国家,作家也可以通过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将自己的创作嫁接在他的传统之上,从而完成高水平的创作。一切取决于开放程度,取决于理解与消化能力。

以《东区挽歌》为例,作者佩蒂纳·加帕是津巴布韦人,可从文本上看,是非常纯粹的黑色幽默,许多段落可以原封不动地植入好莱坞的情景喜剧中。书中写的是津巴布韦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没有独特性,它可以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作家笔下的故乡不再是根脉,而是承载荒诞的容器。

在小说版图上,世界是平的。在今天,创作已经不能只盯着脚下的一亩三分地,所有作者被塞入同一间屋子中,大家以几乎相同的标准来写作。

“短经典”丛书还有一个亮点,即对美国南方作家的介绍相对密集,彼此参照,既能领略这个流派的丰厚,又能看到每个作家的挣扎与突围,这是只看一个作家或凌乱看几本书无法获得的感受。美国南方文学作家往往在故事性与经典性之间努力实现平衡,往往将人压缩成一个符号,他们写夸张的人,而非不同的人,以此调和经典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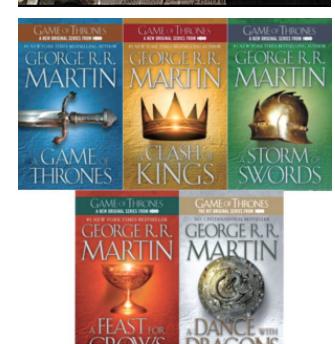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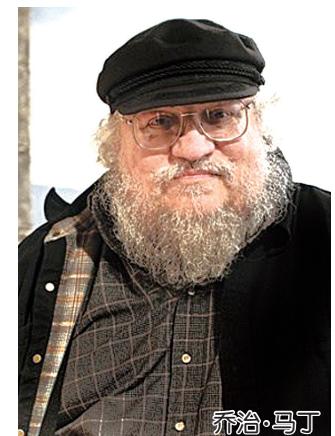
我们缺乏短篇小说的平台

短篇小说的优点是方便阅读,缺点在于挑选读者,没有足够的阅读经验,是无法真正享受这份精神大餐的。而培育读者,就要有环境和平台,这是我们当下最匮乏的。

当下的作者更希望写长篇,因为可以出版,或者被改编成电视剧,写短篇只有极低的稿费收入,甚至可以看成是对作者的侮辱。然而,没有写短篇的充分训练,写长篇往往变成个人经验的廉价拍卖,很难持续,最终落入自我重复的窠臼,作者的内心将过度开发而变得苍白。许多作家初出茅庐时是有思想的,写到后来,转而厌恶思想了。

如果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高稿费可以奖励作者,实现良性竞争,使写作成为时尚,吸引更多读者的围观,对社会发生影响,刊物也更易生存,这就是正向的“马太效应”。相反,如果稿费过低,最终会伤害平台本身,从而步入越压榨越贫血的恶性循环。要改变这个局面,并非文人喊喊就能管用的。

“短经典”带来了临渊羡鱼的可能,至于怎样退而结网,只能肉食者谋之。



“冰与火之歌”系列英文版



都面临着如何突围、如何找到自我的问题,看到这些具体而微的努力,我们才能真正明白创新的方向。

中国在全力向市场化飞奔,小说创作因此凋零,与“新时期”曾经的繁荣相比,我们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似乎正在拉大,在今天,重建外部坐标,找到新的营养,已成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讲,“短经典”这扇窗打开的是如此及时,如此重要。

小说是有意味的形式

“短经典”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展现了当代小说在形式方面的创新。

好的小说读者不关心“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建立一个好的形式很艰难,它是小说的核心价值。在过去两次学习西方的大潮中,国人对新形式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猎奇成分偏多,并不深刻理解形式创新的理由,体现在创作上便是生硬模仿,并无实质的创造力。上世纪90年代,中国作家纷纷远离文本试验,这不完全是市场经济挤压的结果,也有其自身难以继的原因。

当代文学的形式创新源于城市生活,这与此前传统的乡村生活有天壤之别。对后者来

短经典所呈现的世界

“短经典”介绍的作家、作品算不上很新,但还是容纳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信息。

首先,这些小说叙事速度奇快,容量惊人,绝大多数包含了两个故事,比较极端的像高特罗的《赌桌上调味酒》,写了四五个故事,用短篇来营造长篇的厚重感,用复杂故事来展现复杂的人,用开放的结构来匹配人性的多种可能,这需要生命经验的进化。

其次,中国小说的思想方法多是决定论的,故事充满必然性,无法实现更深层次的真实,而在“短经典”中,可能只有罗恩·拉什的《炽焰燃烧》略存此弊端。问题在于:生活真的有“所谓逻辑吗?击垮我们的是不可捉摸的命运,还是隐藏的必然性?如果连作家也不用怀疑论去看世界的话,小说就成了理性主义的帮凶,成为它一个不起眼的宣传员。

第三,心理现实压倒了客观现实,在短经典中,几乎每个故事都是沿着心理线索展开,就算偶尔出现大段的景物描写,也与传统的写实有巨大区别。毕竟,这是一个与环境被隔绝的时代,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力已不再敏感,与此相伴的,是内心情绪的极度膨胀,如何

民族特色”正在消失

在以往的视野中,印度、摩洛哥、津巴布韦等属于文学的“小国”,然而,从收入“短经典”的几个集子来看,他们的成就实在有些让人震惊。

以印度的阿拉文德·阿迪加的《两次暗杀之间》为例,以再老实不过的写实主义写出了

书讯

《人体》

中文简体版出版

日前,意大利“80后”物理学博士、畅销书作家保罗·乔尔达诺的长篇小说《人体》简体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据悉,乔尔达诺将于8月中旬应邀参加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

2011年,通过小说《质数的孤独》,中国读者开始了解保罗·乔尔达诺。事实上,《人体》距离他的处女作《质数的孤独》在意大利出版已有5年之久,5年里,乔尔达诺一直在寻找下一本书的主题。直到他跟随部队前往阿富汗战争第一线,短短的10天留给他极富冲击的印象。他在阿富汗结交了一位同龄人朋友,并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其实每一代人都会经历属于自己那一代的战争。乔尔达诺对自己的新长篇寄予厚望,他在致读者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我的第二本书是一部小说,一部最终能让我对自己被公众推崇的这个位置处之泰然的小说。”

尽管《人体》是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但并不停留在字面上的“战争”,除了硝烟纷飞的战场,乔尔达诺更多触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包括情感上的战争、家人间的战争……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经历了痛苦的蜕变,从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到最终发现变成了自己都觉得陌生的成年人,要去承担他们并不想或还未准备好去承担的责任。

乔尔达诺坦言,《人体》里面的“人”,是书中最真实而又“柔软”的部分。书中的每个人物对于身体都有不同的想法。书中有某种非常强烈的“心理一体质”的特征,这在《质数的孤独》里面也存在。身体具有它自己的远见与不可避免的智慧。



动态

北大纪念泰戈尔获诺贝尔奖100周年

本报讯 6月9日至6月11日,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研究生会联合举办“纪念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100周年活动日”系列活动。

该活动包括展览、新书发布和学术交流、文艺演出等单元。6月9日至1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100周年纪念日图文展”,并展播了泰戈尔相关影视作品。展览共分为4部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泰戈尔生平、泰戈尔与中国、泰戈尔研究在中国以及泰戈尔对中印友好的意义等主题。同时,展览还梳理了国内、特别是北京大学收藏的泰戈尔译著、研究著作和学位论文等,有助于观众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研究在中国的现状。为配合图文展的相关介绍,北京大学图书馆特别调出有关泰戈尔的馆藏图书,其中既有早期译本,亦有最新研究成果。

在6月10日的纪念日开幕式上,芝加哥大学尼赫鲁大学教授谭中以“发扬东方文明真善美精神,迎接东半球文艺复兴”为题做了主题发言。印度驻华大使馆公使B.Bala Bhaskar、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刘明清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程潮翔等也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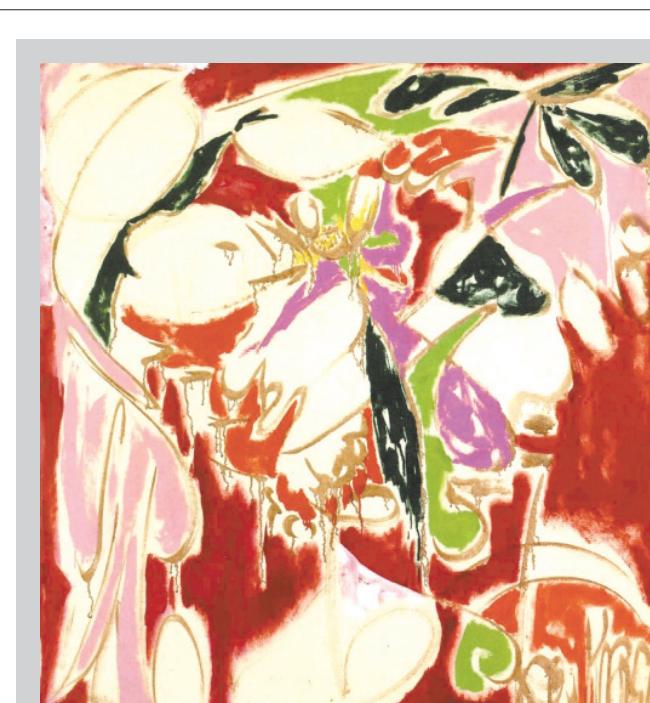
中心主任王邦维主持。开幕式后,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系列”图书正式与读者见面。

学术交流单元分为两个部分,泰戈尔研究者董友忱、毛小雨、刘建、魏丽明等就“泰戈尔与中国的世纪回荡——来自印度泰戈尔大学博物馆中国展馆的讯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行走——泰戈尔、谭云山与中国学院”、“泰戈尔作品翻译:态度与版本鉴别”、“从泰戈尔到泰戈尔学——泰戈尔的“经典化”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谭中发表了题为“中印文化交流对于世界的意义”的专题演讲,并与现场听众展开深度互动。

活动中还穿插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印度舞蹈家金姗姗为观众带来了印度古典舞表演,北大朗诵协会的同学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泰戈尔的多首诗歌,北大剧社则为观众献上了泰戈尔的剧作《邮局》。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直以来都深受北京大学师生的敬仰与爱慕,他的作品更是图书馆里常借不衰的书目。该活动负责人称,在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100周年之际举办主题活动,不仅是为了纪念泰戈尔其人其作,也是为了回应北大师生对泰戈尔的热爱。

(阎鼓润)



美国画家李·克拉斯纳油画作品《倾诉》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